

责任编辑：黄摇敏

封面设计：陈摇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壮族文化论 黄懿陆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4.12

摇 I ①吐...摇 II ②黄...摇 III ③吐族 原少数民族 原民族文化 原研究 原中国摇 IV ④B595.6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345 号
摇

书摇摇名：壮族文化论

作摇摇者：黄懿陆

出版发行：云南教育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200 号)

印摇摇刷：昆明市西站彩印厂

开摇摇本：16 开 1 页 1 页 1 页 1 页

印摇摇张：1 页 1 页

字摇摇数：1 页 1 页

版摇摇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摇摇次：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摇摇数：1~1 页

书摇摇号：ISBN 7-5415-2345-6

定摇摇价：12.00 元

目 录

《壮族文化论》序	赵廷光
第一辑 摇用壮语解读滇国之谜	员
摇有关滇国主体民族的争论	源
摇“靡莫”是越人语言	员
摇滇国民族的代表语言归于“靡莫之属”	愿
摇“滇”是“靡莫之属”的“祠”	缘
摇滇国的出土文物具有明显的越人特征	猿
摇“靡莫之属”遗留着百越部落母氏社会的痕迹	猿
摇探索滇王之谜	猿
摇试揭滇王之谜	源
摇末代滇王之死	源
摇滇王之死有歌为证	缘
摇用《白狼歌》为《滇王葬歌》作旁证	缘
摇破译滇国地名密码	愿
摇“爨”源探说	员
摇“□”为何族	员

目
录

摇滇国越人和云南壮族先民的关系	员苑
摇我对滇国之“夷”的看法	员猿
第二辑摇壮族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员缘
摇壮族源流探说	员苑
摇云南壮族土司世系考释	员园
摇沙氏王族世家	圆猿
摇侬智高秘踪初探	圆猿
摇龙氏土司家族钩沉	圆苑
摇韦郎达和大号国政权	猿园
摇李天保事件及其评价	猿圆
摇富宁传说考	猿员
第三辑摇壮族社会文化研究	猿缘
摇云南壮族历史上的对外交流	猿苑
摇云南壮族土司社会研究	源缘
摇试论云南壮剧的历史源流	源怨
摇《百鸟衣》漫议	缘源
摇富宁掌故二则析疑	缘源
摇广南·三七·《金瓶梅》	缘园
后摇记	缘苑

《壮族文化论》序

赵廷光

1954年底，黄懿陆同志把他发表的《富宁传说试考》寄给我，我曾对文章的深度和广度提出意见，并鼓励他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事后两年，懿陆同志从云南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业余时间致力于文学创作，已出版过小说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等著作，同时还努力对壮族的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多年以来，懿陆同志勤奋好学，读了不少书，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扎扎实实走出了一条壮学研究的好路子，《壮族文化论》就是他这一时期业余研究的成果。

《壮族文化论》研究课题主要是云南壮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从而追溯到滇国的越人文化。该书对滇国的研究从文献古籍中的民族语言入手，不啻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对《白狼歌》的翻译，当属全国首创。全书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读之令人耳目一新，收获不小。

说到壮族，谁都知道壮族历史上出了一个民族英雄侬智高，对其国籍、民族成份及起兵性质等问题，从1955年以来，论者一直持有“否定”和“肯定”两种观点。直到1954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中的

《壮族简史》出版后，这些问题才基本得到统一。历史上侬智高不仅是中国人，壮族，而且侬智高领导的反宋战争，是壮族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民族起义，原因是北宋王朝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造成的。在这次民族战争中，也有汉族人民参加，它写下了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光辉一页。1982年出版的《壮族通史》进一步肯定说：“侬智高领导的反对北宋的起义，是一次反对北宋王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反对北宋王朝对交趾统治者的侵略推行屈从和纵容政策的战争，是壮族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正义战争。”至此，侬智高起义的性质确定下来。但其归宿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着“函首送京”和“莫可知也”两种说法，孰是孰非，双方各执一词，确实是“莫可知也”。黄懿陆同志在《侬智高秘踪初探》中独辟蹊径，根据《宋史》中侬智高的家世和《开化府志》中流寓当地的吴人龙海基为狄青镇压侬智高“乡导有功”的这一线索，进行比较研究，力排众议，得出侬智高并非被大理国王所杀，也不是不知所终，而是化“龙海基”之名，生存于今天的云南文山壮族地区。这又是新的一说。今天当地侬姓壮族，就非常自豪地宣告他们是侬智高的后裔，而云南壮族地区从古至今，一直盛传侬智高未死，还有说现存麻栗坡大王岩上的岩画，是壮族侬智高影身像。《新编麻栗坡地志》载：“古人云，老街路旁克广村，岩上有一蜂王洞，内之蜂王有成妖者，去了广南抬牛羊而食，广南侬智高土司相率其侬人追至老街，见其田源广阔，地土高亢，遂分其族一支，并索其类。侬人至老街治理各类民族，所地更其名曰牛羊土司地。”传说侬智高英武过人，叱咤风云，后来战败藏身山崖，又化为青烟遁入天庭。还传说侬智高失败后逃到此山被困，智高用藤条系桶在畴阳河打水，被宋兵将藤条砍断，水断粮绝，死于大王岩，后来在岩壁上留

猿 摇

下了侬智高的“影身像”，就是今天见到的大王岩画。当地壮族人民对大王岩画毕恭毕敬，怀着崇敬、虔诚的心情，年年祭祀。当然，这些毕竟是传说，但侬智高并非不知所终和被大理国王所杀，而是隐姓埋名，一直生活在云南壮族地区，所以，当地居民有口皆碑，传之不朽。黄懿陆同志的侬智高化名生存之说，为当地的侬智高传说找到了理论依据，是有研究价值的，应该引起壮学理论界的重视。

龙氏土司家族，是云南壮族地区姓氏世袭较全的一个家族。其族世居何地，从《开化府志》开始就含糊其词，莫衷一是。当代研究者延续此说，不知不觉之中为龙氏土司家族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世居马关八寨的龙氏土司迁移到开化府地的“教化山”。更有甚者，还有把龙氏土司张冠李戴的，混淆了龙氏土司的本来面目。懿陆同志钩沉史料，探访、考察文物，以马关县坡脚乡梅子箐的龙氏土司家族的摩岩题刻，到龙氏土司后裔的“龙腾云碑”，广征博引，多方考证，确认龙氏土司世居于今马关县八寨，纠正了《开化府志》和有关史书中龙氏土司世居地的错误。历史上的壮族起义不少，但真正建立政权的不多，历来被史学界津津乐道的只有侬智高在广西建立的大南国（前身为南天国），而黄懿陆同志多方考证后，证明云南壮族地区元代也建立过一个大号国政权；对于彝族入迁云南广南、富宁壮族地区的时间，懿陆同志也有新的一说。这是他为云南壮学研究作出的又一努力和贡献。

《壮族稻作农业史·壮学研究丛书序》引恩格斯话说：“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特点，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壮族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过去说壮族，写壮族，大多以居住

源

在广西的壮族为主，而很少提及云南壮族。这并非是云南壮族没有沉淀于历史深处的文化，而在于没有人去挖掘和研究，发展和弘扬。现在读懿陆同志的《壮族文化论》，可见云南壮族的历史文化不乏独有的本质特点。这些本质特点是壮族文化宝库中的珍珠瑰宝，懿陆同志将它们挖掘出来，是对壮族文化和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民族文化的补充和丰富。

概而言之，《壮族文化论》对云南壮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探讨，但就整个壮学研究体系而言，无论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是有限的，现有的研究成果，只不过是壮学研究的开端而已。要将壮族这个古老、勤劳勇敢民族的面貌再现出来，应该是广大从事壮学研究工作者的漫长而光荣的任务。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像懿陆同志一样，热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民族，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地对各民族的去、现在、未来展开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研究，为繁荣、发展、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作出不懈的努力和贡献。

黄懿陆同志关于滇国历史的传袭、东汉《白狼歌》的翻译、“侬智高化名生存”和“壮族建立过大号国政权”以及上、中、下三蓬自古为我国领土等新说，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应引起壮学理论界的重视，共同深探。同时，也希望黄懿陆同志在现有认识水准基础上，再接再厉，精益求精，使言中之物，言中之据，言中之理更加充分，更加可靠，向求得壮学理论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共识的目标去努力。对此，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我翘首以待。

第一辑

用壮语解读滇国之谜

有关滇国主体民族的争论

有关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氏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司马迁的论述，引发了何为滇国主体民族族属的争论，即主张氏羌民族说者的依据为：“一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上说滇王有名尝羌者，此羌字与羌人的族称相同。同样，《汉书·西羌传》上有羌人酋长名滇零、滇吾者，此滇字又和滇王国的名称相同；二是《史记·西南夷列传》总述了西南民族之后，有‘皆氏类也’一语；三是《华阳国志·南中志》记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平滇之役时，用了‘叟反’二字。按‘叟’即属广义上的氏羌民族；四是今滇池区域附近的路南、峨山等地多彝族，说明古代也应该是彝族先民羌人的主要分布区。羌人即是当地的主要民族，那么滇王国就应该是氏羌民族建立的。”^①

缘 摇

笔者认为，滇国主体民族“氏羌说”依据不足。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对司马迁的观点以列表方式进行如下分类：

部落	归属	政治	经济	习俗	生活	方位	备注
夜郎		有君长	耕田	椎发	有邑聚		
滇	靡莫	有君长	耕田	椎发	有邑聚	夜郎之西	
邛都		有君长	耕田	椎发	有邑聚	滇之北	
□		毋君长	随畜 迁徙	编发	毋长处	邛都西至桐 师以东邛都 北至叶榆	
昆明		毋君长	随畜 迁徙	编发	毋长处	邛都西至桐 师以东邛都 北至叶榆	
徙		有君长		或土著	或迁徙	□以东北	
□都		有君长		或土著	或迁徙	□以东北	
冉□		有君长		或土著	或迁徙	在蜀之西□ 以东北	
白马	皆氏类	有君长				自冉□以 东北	此皆巴 蜀西南 外夷蛮

依上述分类，我们发现早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司马迁“奉使出征巴蜀以南，西界邛、笮、昆明”时，对于当地的民族分布情况业已明察，非常科学地对当地民族进行分类，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把滇部落归于“靡莫之属”。其属之前的夜郎属□□郡，归入越部落集团中的一部分，在史学界已得到公认。滇之后的邛都、□等部落，据《华阳国志·蜀志》越□郡定笮县（今四川盐源县）

说：“□，夷也，汶山（即冉□，汉武帝征服后设为汶山郡）曰夷，南中名昆明，汉嘉、越□曰□，蜀曰邛，皆夷种也。”夷即“氏类”，他们与“白马”一样，属于氏羌的部落。而滇则归于“靡莫之属”，《华阳国志》似乎也认为把“滇”归入“夷”类不妥，仅仅明确《史记·西南夷列传》从“邛都”以下均为“夷”，由是知道，《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皆氏类”，概括的仅仅是从“邛都”至“白马”部落的“夷”，“滇”和“夜郎”并不包含其中。事实上，“夷”不仅仅包含氏类，笔者在文末还有辨释“夷”的论述，此仅以《史记》之述进行分析。《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皆氏类”指的是邛都以下的部落，这才体现出司马迁当时的写作本意。所谓“滇王有名尝羌者”，其“尝羌”只能是司马迁用汉文记录的“靡莫之属”的发音，与“氏羌”的族称是两回事。由于“氏类”是游牧民族，“随畜迁徙”，定居滇国，成为“靡莫之属”的少数民族，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滇国之记载，始见于《史记》，汉王朝赐给滇王金印，时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书·西南夷列传》续载《史记》有关滇国事迹，亦录旧事，没有增加，仍明确滇国为“靡莫之属”。常璩撰《华阳国志》为晋代之事，作者在康帝建元三年（公元373年）曾劝李势归晋^②，其时距汉元封二年，已有182年之久。《史记》、《汉书》未载“汉元封二年”镇压的为“叟”，而载的为“靡莫之属”，《华阳国志》的依据何在

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在《云南史料丛刊》中评论《华阳国志》说：“常璩书载南中事，首为《总序》，其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以前之事迹，大多出自《史记》、《汉书》，多删削，且多错乱，”如对《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汉书》录自《史记》，是忠实于原著，而事隔182多年的常璩则改为：

“南中，在昔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显然，这条记载出现了三条错误：一是把属于“椎结”、“耕田”、“有邑聚”的“滇、句町、夜郎”部落纳入“随畜迁徙”的群体当中；二是句町、夜郎明明是百越中的部落，显然不是“编发”的随畜迁徙“民族”；三是《史记》、《汉书》均载滇国为“靡莫之属”，“椎结”、“耕田”、“有邑聚”，《华阳国志》把“滇”归入“编发”之属，“随畜迁徙”，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方国瑜认为常璩对建安十九年以前的记载“多删削，且多错乱”的判断是正确的。对于汉元封二年之事，《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公元前 107 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

《汉书·武帝纪》说：“元封二年（公元前 107 年），……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昆明诸部地，为益州郡所属。”

《后汉书·西南夷传》又说：“滇王者，庄补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为益州郡，后数年，复并昆明皆以属之。”这里的“复并昆明皆以属之”之役，亦为郭昌所为。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六年（公元前 104 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兵击之。”

从上述记载可知，郭昌是汉王朝建立益州郡的首要功臣，其建郡方式大体如下：

第一，益州郡始建到趋于完善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益州郡是在“靡莫之属”滇国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二是汉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郭昌镇压“昆明”后，亦即《后汉书·西南夷传》中说的“后数年，复并昆明皆以属之”。

第二，益州之役是分两次完成的，而两次的汉军将领均为郭昌。

第三，益州郡的建立，囊括了两大部族，一是滇国旧地的“靡莫之属”，二是属于“叟”的昆明人。

审视《华阳国志》删削《史记》、《汉书》的情况，常璩把滇、句町、夜郎等“椎发”、“耕田”、“有邑聚”的王国归于“编发”、“随畜迁徙”的部落，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从汉代将领郭昌为建立益州郡而发动的益州之役的情况看，常璩是把郭昌的两次益州之役混为一谈。因“昆明”在“后数年”，“复并”入滇国旧地益州郡，即在汉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以后，昆明所居的叶榆一带与原滇国旧地同属于益州郡。据《史记·大宛传》，郭昌所击的为“昆明之遮汉使者”，滇王没有“遮汉”，也不是辫发的昆明人，而是椎结之人。郭昌镇压之“叟”，当与滇王族属无关。

从《史记》关于“西南夷”的划分，说明“氏类”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在长期的迁徙活动中，他们逐渐迁徙到滇国。由于时间太长，到了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时，滇国早已不复存在，流官代替了滇王，益州取代了滇国，“叟”们进入了“靡莫之属”聚居地，尽管间隔 100 多年，但“氏类”在滇国也没有形成主体民族。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建宁郡》中说：“伶丘县，主僚”。伶丘县即今天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地旁 10 公里的昆阳和玉溪一带，滇王墓地一带在晋代